

零餘地與間隙者：《餘地》的多重史觀與敘述¹

李淑君

記憶是複數的，但紀念很單一，有壟斷性。照亮這個就看不見那個了。

——顧玉玲《餘地》，頁184。

一、前言：非虛構到虛構——回應當下

顧玉玲《餘地》於2022年出版，然而於2020年便展開長達八、九個月的時間持續天天寫作，對她而言每天的書寫過程都期待會發生什麼事。完成初稿後寄給「印刻出版社」，安排在2022年搭配《印刻》雜誌封面人物出版。然而，從2021年9月起半年間，《餘地》又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結構未變，調動的都是對話與行動細節，因為人物會慢慢長出之前初稿時沒有意識到的部分。²本文以顧玉玲的作品《餘地》探討多重史觀、間隙之人、尋根與背叛等議題。

顧玉玲橫跨社運者、作家、學術工作者的多重身份。其創作、社運、學術的投注皆不離關注底層、左翼視野、回應社會的關懷。從文

1 本文感謝匿名審查委員具體、仔細、寶貴建議，修改過程獲益良多。特別感謝作者顧玉玲接受本文訪談。

2 顧玉玲受訪、李淑君訪談整理，〈顧玉玲《餘地》之訪談整理〉（2022年10月），未刊稿。

學作品《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回家》到多篇學術著作，持續多年書寫勞動者的血汗印記、遷徙歷程、跨國勞動市場「工地無國界」的現象。³顧玉玲的作品回應臺灣當下重要的社會命題，字裡行間也呈現自身實踐的痕跡。創作軌跡從《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回家》到新作《餘地》，可以看見在作品中融入社會實踐、權益抗爭的足跡。

前行研究多以《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與《回家》展開論述。陳筱筠以華語語系的視野與框架，詮釋顧玉玲作品深化臺灣與菲律賓的連結，拓展華語語系文化的內涵與南方視野。此外，臺灣的跨國移動現象，更拓展跨族群與跨語系的文化創造，其間移動與勞動的歷史過程，更呈現非單一、多元、複數的華語語系創作，在臺灣的各種移動與遷徙，他者與我群相互構成、相互連結成為複數的「我們」。⁴陳筱筠的研究開創性地將華語語系與移工文學進行連結，將文學創作中的東南亞連結拓展華語語系文化的想像。

此外，吳慧娟則從跨國遷徙與障礙觀點討論《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與《回家》兩本作品，是少見橫跨障礙研究、文學研究、移工研究的跨領域研究。其從顧玉玲作品論述來臺移工捲入跨國勞動市場後，在跨國資本主義輾壓下成為健常主義中「不健常」的人。其次，深化障礙議題與移工議題的連結。包含聘僱移工看護工的臺灣人大多是急需照顧支持的障礙者，移工與障礙的緊密關聯性不僅是工

3 參考顧玉玲，〈工地無國界：尋找工殤紀念碑裡的移工〉，《臺灣人權學刊》4.2（2017.12），頁 47-72。顧玉玲，〈勞動者的血汗印記：工殤紀念碑與歷史記憶〉，《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2（2008.12），頁 229-252。

4 陳筱筠，〈複數的「我們」——《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中的主體對話與歷史過程〉，《中國現代文學》32（2017.12），頁 59-74。

殤，更是照顧體系需要打開的視野。吳慧娟將工殤與障礙置放同一框架思考自我與他者以及建立另類結盟的可能。⁵ 吳慧娟指出顧玉玲書寫中涉及的障礙議題、移工議題、跨國資本的緊密交織。

上述研究開拓了顧玉玲書寫中的南方、障礙、複數主體的思考。本文觀察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回家》到《餘地》寫作軌跡，有幾點轉變與延續：

第一點轉變，從非虛構文學轉向虛構文學。《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與《回家》是奠基在多年的勞工抗爭、勞權爭取的行動，書寫風格上是紀實寫作的風格。顧玉玲 2014 年完成的《回家》，是在越南進行實地踏查後的書寫，⁶ 更融入受訪者的自述以及民族誌的田野紀錄。⁷ 此非虛構書寫，是創作者與受訪者之間共同創作、相互構成的作品。相較之下，《餘地》虛構小說的特徵，更多寫作者對歷史的思索與對當下的回應。此種差異，顧玉玲認為對她而言，非虛構文學在寫作的當下，是書寫已經得知的事情，只是思考以何種方式與讀者溝通。⁸ 相對的，虛構寫作則是與筆下的人物對話。因此其書寫軌跡看到非虛構文學到虛構文學之間，寫作者自身對於不同文類的寫作差異思考。

根據本文對顧玉玲的訪談，對她而言：「不管虛構寫作或非虛構

5 吳慧娟，〈遷徙與障礙：顧玉玲的《我們》與《回家》〉，《中外文學》47.1（2018.03），頁 77-114。

6 黃慧鳳，〈女性移工的跨域遷徙與回歸——以顧玉玲《回家》為例〉，《藝見學刊》19（2020.04），頁 71-84。

7 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臺北：印刻，2008），頁 121-123。

8 郝妮爾，〈角色在腦海裡敲打 30 年，窮盡一生的田野，捕捉不可言說之事：專訪顧玉玲《餘地》〉，網址：<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6274>，瀏覽日期：2022.09.14。

寫作，都是跟著人物走。從此點來說虛構與非虛構差異不大」，差別僅在於「非虛構若沒有採訪到、沒有看到，不能為了情節的推動去創造出來」，此外，「非虛構寫作很有多倫理的考量，包含要暴露到哪裡」，或是關切的事件累積多年，資料繁多，此時想要把社會結構解釋清楚，又想讓讀者認識到事件中人是有血有淚，但倘若一些細節作者不在現場或沒有訪問到，雖然可以從研究相關資料去補足欠缺，但依然有限制。⁹對顧玉玲來說，非虛構寫作更「接近社會責任。」目前依然有非虛構寫作的期望，因為「還有一些該寫但還沒寫的責任感」。¹⁰虛構寫作上相對自由，此外，小說創作是看向那些幽微不明、曖昧的、費解的另一種可能性，這可能更接近於真實的。¹¹因為現實人生不是非黑即白，小說以人物訴說故事，在故事裡頭的人物不需要去說出價值判斷，價值是呈現在行動中，而非論述當中。¹²

第二點轉變則是書寫議題上從勞工文學轉向白色恐怖主題。《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與《回家》是顧玉玲將自身多年的勞工權益、跨國經驗、社會運動化為文學作品，凸顯受訪者自身的話語與訪談。白色恐怖為主軸的《餘地》，則是以臺灣百年歷史展開，融入多元歷史觀點的書寫。張亦絢也提及《餘地》是以家庭、性別、臺灣敘事作為書寫起點。¹³

在創作軌跡的延續上，首先，最明顯的就是可以看到顧玉玲的寫

9 顧玉玲受訪、李淑君訪談整理，〈顧玉玲《餘地》之訪談整理〉，未刊稿。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張亦絢，〈若即若離能動性：略談餘地的記憶暫緩與加速〉，《餘地》（新北：印刻，2022），頁11-16。

作依然有很深的社會介入，以及以書寫回應當下。寫小說或非虛構寫作對顧玉玲來說，「回應當下」的關懷還蠻一致，寫作是回應當下，而不只是看向來路。¹⁴ 此外，童偉格在討論顧玉玲的書寫中，關注我與他者之間的對話，我們與他者之間是具有關聯性的同代人。¹⁵ 本文認為顧玉玲的書寫從《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回家》到《餘地》，都在思考我們與他者之間的關聯性，是互相照見、相互連結的網絡，以及對當下的回應。

其次，顧玉玲創作的延續性尚包含其書寫不論從非虛構寫作到虛構寫作，其創作過程皆非在書房完成的文學寫作，而是在田野、在街頭、在抗爭、在訪談中完成。寫作從過程到完成，作品都含著實踐性格。如本文訪談，顧玉玲提及：她寫作透過史料、紀錄片、訪談、自身走訪搭建場景，人物才能放置其中。顧玉玲曾經詢問《餘地》廖惜那一輩的人物，就教坐過政治牢獄的前輩來重返現場，藉此細膩地了解時代氛圍與場景的細節。甚至某些場景即使自身曾經非常熟悉，然而時過境遷，依然需要重返場景來進行寫作。此外，作品中有很多史料的轉化，也是長期的累積。教學過程她曾開設「口述歷史」、「記憶政治」等課程，就大量使用小說中所提及的史料，因此小說展開時，已經有一定的把握。而多年身處於勞工議題的關切與投入，也成為寫作的養分。她多年勞動議題的經驗，讓她在創作小說過程會將勞動職業仔細描述，對顧玉玲來說：「在當代社會中每一個人浸泡在工作時間很長，會改變我們的行動與身體。在寫的時候，是有意識把勞動寫

14 顧玉玲受訪、李淑君訪談整理，〈顧玉玲《餘地》之訪談整理〉，未刊稿。

15 童偉格，〈在並不慷慨的歷史中〉，《餘地》（新北：印刻，2022），頁 6-10。

進來。」是過去三十年來的經驗，使顧玉玲有把握書寫這些事情。¹⁶

顧玉玲在書寫《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與《回家》時，就提及書寫的意義在於留下紀錄。因為倘若沒有紀錄，許多經驗就只是成為個人成長的養分，而沒有推進為一個公共財。因此書寫對顧玉玲而言有一個急迫性：便是希望議題、人物、事件能被別人看到。¹⁷雖然此為非虛構移工書寫的體悟，但在《餘地》的創作過程，也是參考陳明忠回憶錄等許多史料，呼應她所提及：《餘地》雖然是虛構文學，但「動用的是她一生的田野」。¹⁸此書也隱含公共發聲的意圖。

在面對白色恐怖當下，社會經常充滿寬恕、和解、不要製造對立、讓過去成為過去的輿論，顧玉玲認為書寫《餘地》的目的「並非和解，和解還太遠」，想談的「其實是理解」。¹⁹在討論寬恕、原諒與過去之前，理解是最重要的一課。《餘地》書名，隱含著「『餘地』多半畸零，崎嶇難立，甚且不得容身，不過是免於僵化罷了」的寓意，²⁰歷經多重殖民、政權轉移的臺灣人，彷彿立足於畸零之地，生存的脆危、生命的難為，需要理解畸零之地的處境，才能往理解邁進一步。

¹⁶ 顧玉玲受訪、李淑君訪談整理，〈顧玉玲《餘地》之訪談整理〉，未刊稿。

¹⁷ 顧玉玲，〈理論與實踐的辯證：專訪顧玉玲〉，網址：<https://www.taiwanhrj.org/interview/203>，瀏覽日期：2022.12.13。

¹⁸ 郝妮爾，〈角色在腦海裡敲打 30 年，窮盡一生的田野，捕捉不可言說之事：專訪顧玉玲《餘地》〉，網址：<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6274>，瀏覽日期：2022.09.14。

¹⁹ 同上。

²⁰ 顧玉玲，《餘地》（新北：印刻，2022），頁 367。

二、臺灣本土左翼史觀的白色恐怖

《餘地》書寫臺灣百年史，其中包含跨域遷徙、多元族群、多重殖民的歷史記憶。諸多歷史記憶卻在政權轉替的過程成為不可、不能被記憶之禁忌。如臺灣人曾經「身為日本人而戰」；²¹ 日治時期躲空襲的回憶、廖惜與母親如混血兒般的膚色，訴說著經歷過荷蘭、日本、國民政府多重殖民歷史，也形塑橫跨原住民族、客家族群、外省族群、跨族群通婚後代的多族群歷史，呈現臺灣多重殖民、多族群下的混種族群（hybrid ethnicity），²² 此種跨族群、多重殖民的歷史正是以臺灣為書寫主體的史觀。

除了混雜的族群與歷史，在白色恐怖的書寫上，顧玉玲呈現了一種結合臺灣主體本土精神與左翼歷史觀共融的特點。在白色恐怖的社會輿論，經常將白色恐怖經歷簡易地區分具有本土史觀的獨派案件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左翼案件，獨派案件被視為具有臺灣主體意識展現與臺灣本土精神的象徵（如美麗島事件、泰源事件等獨派案件）；相對的，左翼色彩的案件又輕易地貼上左統標籤（傾中、左派、臺灣民族精神的缺乏）來解讀。然而，左翼思潮並無法以今日統獨對立立場來解讀，「左統」一詞為後來的發明，也不適合解釋與理解 1950 年代的社會主義思想。筆者曾經討論過在國際冷戰、國共戰爭結構下，恐共、反左的氛圍使左翼研究成為禁忌與斷層。少數左翼案件研究中，

21 梅家玲，〈後戰爭〉，收入史書美、梅家玲等編，《臺灣理論關鍵詞》（新北：聯經，2019），頁 157-165。

22 臺灣多位族群研究學者也以混種族群提及臺灣的族群現象。如謝若蘭，《在，之間。In between 認同與實踐之間的學術研究儀式》（新北：稻香，2017），頁 14。

林正慧以 1950 年代省工委和臺盟案件為例探討組織發展、組織瓦解與判決人數。²³ 林傳凱則針對省工委會的動員模式、意義生產、組織發展深化地下黨的研究。²⁴ 藍博洲指出臺灣社會雖然對五〇年代政治犯人們有相對友善的眼光；可面對政治犯的左傾思想，還是存在著排斥。²⁵ 林恕暉也提及國共內戰後左派成為禁忌，白色恐怖更企圖將左派斬草除根，「左」成為負面象徵。²⁶ 左翼政治事件研究雖然在學術圈有不少成果，但社會氛圍在「反共」的歷史延續下尚處於某程度的禁忌。顧玉玲的書寫則是將臺灣主體與左翼史觀結合，書寫出臺灣本土左翼史觀的視野。

顧玉玲在塑造主角張進善時，是置放在臺灣被殖民的歷史脈絡中。進善日治時期就讀公學校，在學校結識日本女孩純子並產生愛慕之情。12 歲加入「少年海軍工員」，在日本海軍工廠成為少年工，努力不懈希望自己能與日本人平起平坐，甚至認為自己是「偉大戰爭中很小的螺絲釘」。²⁷ 渴望成為皇民的進善，在昭和天皇玉音放送時，

²³ 林正慧，〈1950 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臺灣文獻》60.1（2009.03），頁 395-477。

²⁴ 林傳凱，〈胎死的秘密革命家組織：重讀 1940s-50s「省工委」發展中的四項保密機制〉，「2011 臺灣社會學年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1.12.10-11。林傳凱，〈黑暗中的認知、風險、與共同體想像——省工委（1946-1953）地下抗爭的動員模式與意義產生〉，「2012 年臺灣社會學年會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臺中，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 2012.11.24-25。林傳凱，〈戰後臺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1945-195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博士論文，2018）。

²⁵ 藍博洲在書寫余聲潤的訪談也指出對於左翼政治受難者哀悼的禁忌。見藍博洲，〈藤纏樹〉（臺北：印刻，2002），頁 96。

²⁶ 林恕暉，〈1990 年代的臺灣左翼媒體——《群眾》雜誌及《群眾之聲》電台之個案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新聞暨傳播學院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17）。

²⁷ 顧玉玲，〈餘地〉，頁 94。

看見工廠領班、舍監毫無保留的痛苦，卻有一股說不清的痛快。「在失敗者的陣地搖身一變成為戰勝者」、「勝利感的取得，不是因為打贏，而是因為打輸」，²⁸ 充滿殖民地臺灣的矛盾。戰後，進善在各種外省口音夾雜下，再次感到矮人一截。新時代來臨，進善「熟悉的語言一夕間失去效益，淪為文盲。」²⁹ 甚至因為流利的日語，「到公所辦事被斥責為殖民地奴性」。³⁰ 此段書寫出臺灣人的困境，在戰前的身分、愛情、語言、工作、努力，在戰後都成為漢奸、殖民地奴性、嫌疑之人的證據。曾經的少年工經歷在改朝換代之後也已成爲汙點。這是從臺灣殖民地歷史視角所書寫的臺灣人命運。

然而，進善戰後考入師範學院且參與詩社。詩社指導老師姜秋霞帶領學生談國際情勢、談俄國農民苦難歷史，閱讀高爾基、《大眾哲學》。其中艾思奇《大眾哲學》強調哲學來自大眾；也必須回歸大眾，哲學並非在學院高談闊論的抽象思維，而是必須在街頭、在工廠、在農村中被閱讀的左翼精神。³¹ 顧玉玲書寫進善時，細緻地書寫了參與的詩社所閱讀的書籍與討論，呈現了戰後初期很蓬勃的左翼思潮。戰後到 1950 年代，左翼的思想史是中國大陸左翼與臺灣本土左翼作家的匯流。如戰後興起的一波「魯迅熱」，包含國語補習班閱讀魯迅寫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亦有巴金、老舍等人的文章。從中國來臺的國語補習班老師計梅真曾教授的簡國賢的〈壁〉與楊達的〈送報伙〉，可以看見左翼文化與思想，跨越省籍匯流於臺灣這塊土地上，

28 顧玉玲，《餘地》，頁 149。

29 顧玉玲，《餘地》，頁 151。

30 顧玉玲，《餘地》，頁 151。

31 艾思奇，《大眾哲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大眾哲學》為 1936 年艾思奇所撰寫的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讀本。

豐厚戰後初期的左翼思潮。在左翼思想的發展上，郵務工會第一任理事長陸象賢提及參與錢靜芝在郵工補習學校時，工人們閱讀《新民主主義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大眾哲學》、《唯物論》等書籍。³² 顧玉玲書寫張進善，便是將張進善置放在戰後蓬勃的左翼文化思潮當中。

當讀到顧玉玲對張進善的塑造，令人深感這一本作品對於歷史十分用功與謙卑。張進善的角色回應了許多左翼案件的實際經驗，如彭金木曾經擔任過日本兵，戰後因為臺灣民主同盟案的左翼案件而入獄；³³ 許金玉、張金爵等人也經歷日本殖民，在戰後參與左翼行動而涉及左翼案件而入獄，皆為經歷臺灣本土殖民經驗的左翼案件。³⁴ 張進善的塑造，回應了一段臺灣人殖民歷史與戰後左翼思潮的臺灣本土左翼史觀。

對顧玉玲來說，本土與左翼的斷裂從來沒有發生，是自身對臺灣本土與左翼斷裂史觀的不滿。然而，進善一角的塑造是呈現那個時代若想改變社會，受到左翼影響是必然的。顧玉玲寫作時「沒有那麼意識到要將左翼與本土結合，但從史料中來看，當時時空背景下，左翼就是進步思潮。進善的設計不是那麼清晰，余啟正相對年紀較長，左

32 李淑君，〈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左翼女性政治受難者：女性身份、女性系譜、政治行動〉《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8.2（2021.12），頁 75-148。

33 謝南陽等口述，黃旭初主編，《政治標記，白色夢魘：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 3》（高雄：高雄市政府歷史博物館，2015）。

34 李淑君，〈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左翼女性政治受難者：女性身份、女性系譜、政治行動〉《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8.2（2021.12），頁 75-148。陸象賢，《九三述懷》（臺北：中華基金會、臺中：辜金良文化基金會，2009），頁 179-184。陸象賢主編，《魂繫臺北：紀念臺灣郵電工人運動先驅》（新陽印刷事業有限公司，2002 年 8 月），頁 46。

翼則接近信仰」。³⁵ 本身就投入勞工運動的顧玉玲，其左翼關懷是長期而持續的；本土史觀則在二十歲時閱讀吳濁流的《臺灣連翹》，就此翻轉在教育體制中的抗日史觀，思考臺灣歷史的主體性。三十年持續閱讀，顧玉玲提及所認識的父執輩，心理總有一種虧欠是：「從來不認識他們。回頭去推算，戰爭時如果他十多歲，那他想從軍嗎？戰爭中他經歷了什麼？這促使我解嚴之後，打開視野，去想我們根本不認識他們。因為長期的壓抑與不能言說。」、「小說中廖惜的那一代，（我們）就需要重新學習。」³⁶ 所以顧玉玲提及：「動用一生的田野」書寫《餘地》。對顧玉玲而言，歷史敘述經常是單一的、排他的，只紀錄單一甚至經常是可疑的敘述，《餘地》所寫的不是歷史，而是當下。過往沒有意識到自己想寫這本小說，因為當時尚有社會運動的迫切性，對身處第一線運動者多年的顧玉玲來說：「寫作對於運動者來說，是最末端的事情。」³⁷ 但書寫，一直都是回應所處的當下。

三、零餘者與夾縫中

《餘地》以畸零地的意象，回應生存於餘地處境中的間隙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談間隙時提及「間隙文化」（culture's in between），³⁸ 指涉文化間隙的混雜狀態。然而，顧玉玲小說中，間隙

³⁵ 顧玉玲受訪、李淑君訪談整理，〈顧玉玲《餘地》之訪談整理〉，未刊稿。

³⁶ 同上。

³⁷ 同上。

³⁸ Homi Bhabha, "Culture's in-between," in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ed. Stuart Hall and Paul

除了混雜的身分，更是非此非彼的尷尬處境與縫隙之人。進善身處夾縫的意義有三：第一層夾縫為因改朝換代而成為歷史錯的那一方；第二層夾縫是成為同伴的背叛者，在入獄幾個月釋放後沒有檔案而成為無法獲得賠償肯認的那方；第三個夾縫為世代斷裂。進善在日治與戰後皆與父執輩斷裂。戰後白色恐怖經歷使得進善心懷愧疚、自責與恐懼，以扭曲的心態阻止子女參與社會運動，在上下世代的斷裂中成為夾縫之人。

張進善就讀日治時期公學校時，開始學習「內地」腔調，此種學舌是被殖民者以殖民者的舌頭取代自己的舌頭；以殖民者的眼睛凝視自己的自我。進善 12 歲加入「少年海軍工員」，在日本海軍工廠成為少年工，努力不懈希望自己能與日本人平起平坐。戰後，進善在各種外省口音夾雜下，「熟悉的語言一夕間失去效益，淪為文盲。」³⁹甚至因為持有流利日語，「到公所辦事被斥責為殖民地奴性」。⁴⁰在日本殖民下，進善努力成為日本人，戰後努力成為中國人，正是杜博依斯（W.E.B. Du Bois）所提及的「雙重意識」。「雙重意識」使受壓迫者透過他人的眼光觀照自我，利用殖民者世界的捲尺衡量自己的靈魂。被殖民者總是有雙重性，此雙重性即是被殖民者體內居住著殖民者的靈魂。⁴¹進善以殖民者的眼光看待衡量自己，卻又感受到不平等的扭曲與憤怒，如即使渴望成為皇民卻在昭和天皇玉音放送時，看著工廠中的領班、舍監毫無保留的痛苦，卻有一股說不清的痛快。「在

du Gay (London: Sage, 1996), pp.1-17.

³⁹ 顧玉玲，《餘地》，頁 151。

⁴⁰ 顧玉玲，《餘地》，頁 151。

⁴¹ 杜博依斯著（W.E.B. Du Bois），何文敬譯，《黑人的靈魂》（新北：聯經，2018），頁 74。

失敗者的陣地搖身一變成為戰勝者」、「勝利感的取得，不是因為打贏，而是因為打輸」的複雜心情，⁴²擁有雙重靈魂的被殖民者，擺盪在殖民與被殖民之間，在兩者之間無所安頓的狀態便是一種間隙狀態。

進善與上一代的斷裂與間隙狀態，包含他想成為少年工、想成為皇民、戰前學習日文、戰後學習中文等行徑在不識「國語」（日文、中文）父母眼中都是「讀冊讀卡頭殼歹去」。⁴³進善身處歷史洪流下失去與上一代的連結。此外，進善女兒眼中，父親是陰鬱、憤怒、寡言、不得志的形象。遙遠（進善二女）童年「最怕寒暑假，父親在家時間長了，她都不敢走進客廳，更長時間地耗在店面當母親的小幫手，連作業都搬到櫃台寫，就怕不小心掃到父親沒來由的遷怒」，女兒躲避父親，使得進善與女兒之間的斷裂讓進善更處於縫隙中的人。進善與上一代的斷裂，重演在進善女兒身上，成為三代人彼此之間的斷裂。

戰後日本經驗的禁忌，則是透過不可說的愛情的闡述。純子象徵進善的青春時光，也是戰後政權轉移後一段不被承認的人生，這一段不被承認的人生也成為白色恐怖牢獄後的求生寄託。無法承認的人生，則是成為間隙之人的另一層次。梅家玲提及「戰後」一詞，不足以解釋臺灣因戰爭因素體現的複雜性，「後戰爭」則可以關照到臺灣在戰爭的遺緒與動態的發展。1949年國府遷臺，戰爭之後更呈現不同戰爭經驗、戰爭遺緒相互拉鋸的動態發展。⁴⁴進善在1945年之後也

42 顧玉玲，《餘地》，頁149。

43 顧玉玲，《餘地》，頁93。

44 梅家玲，〈後戰爭〉，收入史書美、梅家玲等編，《臺灣理論關鍵詞》（新北：聯經，

陷入「後戰爭」的拉鋸之中，梅家玲提及「作為日本人而戰」的議題，更需要思索的是「誰在記憶？誰在敘事？站在什麼位置上記憶與敘事？」⁴⁵ 進善在國民政府時期，「作為日本人而戰」的經驗，而為不可說的經驗；日本時代的青春愛戀，也只能成為不再實存的追憶。

進善戰後考入師範學院，參與詩社閱讀左翼被捕。戰後進善成為眉宇鬱悶，內在憤懣之人。戰後失語重新學中文，甚至少年工經驗使得他戰後從歷史對的一方成為歷史錯的一方。白色恐怖大逮捕、大審判時緊繃氣氛，進善半夜總是獨坐後院，把自己埋藏在菸霧當中。餘生以簽賭賽鴿轉移自己的注意力。白色恐怖時期，進善曾經招供出友人余啟正，自責自己是軟弱、怯懦之人而招供。進善招供之後，寫下悔過書，被無罪釋放成為自新之人，雖是無刑之身，卻是有罪之人。此罪即是背叛者的罪。終身自我究責為有罪之人。廖惜眼中，進善「有的恐懼是不能說的，也許因為太久了一直沒有人說過，缺乏現成的語彙，不曾被定義，若有似無像咒語般解不開。進善很可能就是受困於無名的恐懼，綑綁一輩子，掙不開。」⁴⁶ 蘇珊·奈門（Susan Neiman）《父輩的罪惡》提及受害者因為恥辱而沉默；加害者因為內疚而沉默。羞愧感、罪疚感皆令人痛苦。然而面對羞愧，需要有立足之地。⁴⁷ 進善為同伴們的背叛者與我群之外的餘者，因此身處間隙與夾縫中。

進善逝世多年後，課本才遲來出現白色恐怖的字樣，臺灣才開

2019），頁 157-165。

⁴⁵ 梅家玲，〈後戰爭〉，收入史書美、梅家玲等編，《臺灣理論關鍵詞》，頁 157-165。

⁴⁶ 顧玉玲，《餘地》，頁 191。

⁴⁷ 蘇珊·奈門（Susan Neiman），張葳譯，《父輩的罪惡：德國如何面對歷史》（新北：衛城，2022），頁 516-517。

始談論這段歷史。然而歷史終於解禁，非獄友的進善其身分又尷尬地處於政治受難者／非政治受難者；背叛者／受難者之間的混雜情境。進善未被判刑，顧玉玲傳達了「那個年代被白色恐怖牽連到的人，判不判刑都是一輩子的陰影，受害如何能夠量化？反帝、反殖民的大敘事，若沒能收束至個人經驗的具體呈現，又如何能夠撼動人心呢？」⁴⁸訴說著判刑與否，不一定是苦難的證明。顧玉玲選擇邊緣的進善作為主角之一，她想說每個人都生活在時代之中，「身邊那些失語的男子，他們都沒有坐過牢，但他們都在時代的籠罩之下。進善的背叛身分都不是那麼直接，但即使如此也都會啃噬、綑綁了他的一生。一開始並沒有此書寫意圖，但在寫的時候，一直回應我所處的當下。」⁴⁹進善因被釋放而成為檔案中沒有紀錄的政治犯。在戰後的補賠償中，進善也成為無名之人，尷尬地承擔歷史卻沒有歷史承認，此亦為間隙之處。

此外，《餘地》藉余啟正之口說「我們一票學生都被捉了，那些記者、工人全都被判了重刑，一整串捉起來，還有誰是能夠害到誰呢？」⁵⁰說著招供與否、加害／被害非二分的狀態。《餘地》強調了惡並非與日常無關。對行為者的想像可以更複雜，而不是將行為者妖魔化，因為妖魔化僅是產生「愈壞愈和自己無關」之錯覺。⁵¹小說中進善、芬芳皆是背叛者。女兒芬芳因為父親進善與好友幼純之間的情誼，向學校告密下課後兩人獨自相處審閱文章。日後芬芳自責因為忌

48 顧玉玲，《餘地》，頁 217。

49 顧玉玲受訪、李淑君訪談整理，〈顧玉玲《餘地》之訪談整理〉，未刊稿。

50 顧玉玲，《餘地》，頁 218。

51 顧玉玲，《餘地》，頁 348。

妒而出賣與背叛父親與好友。⁵²小說的背叛者其實也是共痛者。

解嚴後，「自認清白的人們籲求真相，他們振振有辭，理直氣壯。進善曾親筆寫下同儕名單的供詞，將如何被檢視？他如何辯稱他審慎考量過，寫出來的全是早已曝光的名字？真的會有人想知道嗎？錯了就是錯了，還狡辯什麼？」⁵³曾被捕的進善，成為沒有檔案的受害者，在補賠償中是無名之人；在檔案檢視中，進善是否會成為供出同儕的加害者？也是顧玉玲透過《餘地》拋出來的重要議題。

小說中，進善、芬芳皆是招供、告密與背叛者。顧玉玲思考追求正義過程的罪與罰：

我在乎罪與罰在史料不清楚的狀況下不斷被談，我在乎輕易的定罪與輕易的處罰。彷彿定罪與懲罰就盡了社會義務。戰後德國也是不斷進進退退、不斷掬洗對於罪的看法。罪與罰從來不是如此輕易與簡單。背叛是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發生，背叛造成的傷害是明確的，但背叛有自我撻伐的部分，罪與罰如果太快的定罪，也就太快速的解脫，然後就收進歷史檔案中。⁵⁴

顧玉玲認為這幾年的臺灣「轉型正義」的推進，太快論定今日就是正義，當很快地單一去指責誰是『抓耙仔』，同時也墊高了自己的政治籌碼，彷彿這些『抓耙仔』經歷了什麼，談都不用談。」「當時

52 顧玉玲，《餘地》，頁 326。

53 顧玉玲，《餘地》，頁 280。

54 顧玉玲受訪、李淑君訪談整理，〈顧玉玲《餘地》之訪談整理〉，未刊稿。

有這麼多的線民，他們跟我們一樣受到忠黨愛國的教育。然而社會非常扁平化面對這些人的認識。事實上，每一個階段都不同，許多（目前）沒有說清楚、混雜的欠缺討論」。⁵⁵

另一位夾縫中人，為政治犯余啟正。余啟正老年時已經不復記憶。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監獄經驗，在晚年留下的痕跡是隨時高度警覺，在家講電話時會先探頭看看門外；入家門時會掀起百葉窗的小縫往外偵查幾分鐘，確定無人跟蹤時才放心回家；全家出門時余啟正會在門窗縫布置一些隱密的小機關，如落葉，回家後一一檢視是否還在原位。被跟監的時代反映在老去的余啟正的症候上。余啟正的記憶，「不願忘記過往承受的痛苦，彷彿只要一鬆懈了，就是背叛，背叛青春，也背叛死去的人。」⁵⁶ 余啟正寫寫藏藏，出獄後如同不曾離開綠島，「他努力以一己之力，抵抗整個社會的集體失憶，綠島的六年刑期，主導了他出獄後六十年的人生。」⁵⁷ 對於余啟正來說，「當年被槍決的人還抱著希望，我們這些活下來的人才真的難堪，一事無成啊。」⁵⁸ 雖然余啟正與進善同樣被捕，但認為就算同樣被捕，「同樣受到傷害，彼此之間還是有很大的矛盾，無法互相體諒。」闡述經歷過同一件創傷的人，不一定可以理解彼此的痛苦。

身處於餘地的脆危狀態，包含中國大陸遷徙到臺灣的來臺士兵謝蔚海。謝蔚海「生平頭一回見到海就是退敗來臺」，後被退輔會安排投入公路的建設工程，炸隧道時削斷了左腿，左腳因而短了數公分。

55 顧玉玲受訪、李淑君訪談整理，〈顧玉玲《餘地》之訪談整理〉，未刊稿。

56 顧玉玲，《餘地》，頁 209。

57 顧玉玲，《餘地》，頁 210。

58 顧玉玲，《餘地》，頁 216。

後到砂石廠當警衛。中年與帶著五歲兒子的銀花結婚。婚後以紅紙寫下「堂上謝姓歷代祖考妣之神位」，有了祭拜之位，人生就此落地生根下來。後謝蔚海身亡於塵肺症，因為當警衛的砂石廠，「翻砂打石的粉塵暴露，就像礦坑一樣。」顧玉玲《餘地》的間隙是互相看見，從本省籍的張進善、余啟正，到外省籍的謝蔚海，都捲入時代浪潮中，人人都身不由己。謝蔚海的書寫，顯露出顧玉玲長期對於勞工的關懷，投入國家建設的外省榮民，成為葬身或獻祭於國家的工殤。上述的互相映照，都是身處於餘地的間隙之人的書寫。

四、解密者 / 解夢者

小說中，進善之妻廖惜為客家人，婚後族譜沒有她的名字，身為嫁出去的女兒就此成為閩南人的媳婦，廖惜雖未受太多教育，對於自身家鄉地圖更甚於在學校擔任地理老師的進善。進善因抽離的大中國地理教育而感到苦悶，廖惜卻以雙腳踩在大地上而與土地貼進。廖惜身為客家、女性、未受高等教育的多重身分，反而脫離教育中僵化、疏離、扭曲的黨國教育。廖惜質疑為何臺灣四面環海，卻對海洋如此陌生的戒嚴文化。廖惜不但是貼近土地者，進善無法言說的情感與痛苦，也是由廖惜說出口。廖惜也透過夢境更加理解進善的苦痛，並解開謝真的身世之謎，成為解夢者。

相較進善身處體制中而虛無、苦悶與失語，顧玉玲提及廖惜的傷痛則需要一個說法：

她不清楚老公的鬱悶，因此心裡頭是有怨恨的，可是如何解開怨恨與自責？得從歷史給她一個說法，她才能放過她自己。我覺得這反映了七、八十歲那一輩的女性。那一輩的女性都是奮力撐下來的那種人，但是很多加諸在他們身上的各種困頓，缺少一個集體說法。因為那並非個人能否看破或看開，這是集體的社會困境沉沉壓在她們身上，致使她們臨老也無法放鬆，不能放過自己。我特別心疼以及想要趨近這些女性，我生命中親近的年長女性們，以不同的方式撐在那裡，承擔了時代的餘震與難題，但沒有被好好解釋。有些承擔不是因為她做得夠不夠好，而是整個結構的問題，沒有人能倖免於難，她們已經做很多了，可以了。我在小說中，讓廖惜有機會與年輕人一起補課，多一點歷史厚度的理解，進善的扭曲是整個世代的扭曲，不是她的責任。對廖惜來說，傷害已然造成，理解不必然帶來原諒，但也許透過理解才有機會和自己和解，放過自己。我覺得社會對她們欠缺一個解釋。⁵⁹

廖惜的強韌、解夢、寬容、怨恨並存。但小說不太呈現廖惜的怨恨情緒，而是透過面對自己的議題，自身也更加理解過去，並與臺灣歷史條件接軌。

另一位女性角色余啟正之妻、布農女子秋美也是土地象徵。當部落族人從日本殖民、國民政府來臺，被迫更換自己的姓名與語言，

⁵⁹ 顧玉玲受訪、李淑君訪談整理，〈顧玉玲《餘地》之訪談整理〉，未刊稿。

相較於余啟正的漢民族情懷，秋美的認同則為部落。然而臺灣在大興土木的經濟起飛階段，部落的河床遭商人偷挖砂石，砂石車來往於部落，秋美因而遭到砂石車撞上身亡。「臺灣經濟起飛了，部落經濟瓦解了，山上的年輕人湧進都市掙錢，再返鄉蓋房子，產業道路上來來去去飛馳的砂石車，換來部落裡一棟棟新蓋的雙層水泥屋。」⁶⁰ 秋美之亡，是來自經濟對部落的剝削，認同部落的秋美，被輾壓的過程，也是粉碎了部落的狀態。

顧玉玲安排廖惜、秋美，都是更貼近土地、認同部落之人。身為女性、客家人、原住民的身份，在族群上是少數；在性別上是弱勢，少數又弱勢的女性卻是立足於土地、認同於部落、有能力解開身世之謎的人。

五、尋根者與失落者？

尋根者謝真為謝幼純與白色恐怖第二代余霽之子，母親幼純為自覺、自主的女性。幼純年輕時出國生子，並以勞動養活謝真。謝真卻發現進善寫給母親的信，而來到臺灣尋找自己的身世。父祖輩為跨省籍通婚的謝真，在中國大陸尋找到的盡是祖墳。去理解了幼純成長的眷村中，多的是為了把日子過下去「不合格的婚姻、七拼八湊的家庭」。⁶¹

⁶⁰ 顧玉玲，《餘地》，頁 240。

⁶¹ 顧玉玲，《餘地》，頁 253。

進善女兒遙遠因著謝真的信，重新尋找父親的故事，才開始認真思索爸爸的生平，知曉「爸爸年少時去日本做工，雖是製造戰爭機器，但沒真的上戰場殺戮；後來因為白色恐怖被捕，又無罪釋放，也沒真坐過牢。他也許只是個隨波逐流的人，只不過風向轉太快，他被拋到漩渦裡，無力掙扎。在這個翻案的年代，他不是普遍定義下的受害者，也沒什麼具體冤屈好平反，他甚至是隱藏版出賣者，連創傷都沒得說。」⁶² 一直與父親有距離與疏離感的遙遠，透過追尋讀出父親的無奈。在協助母親廖惜、幼純之子謝真前往余啟正之家，更縫合自己與父親進善之間的距離。

二代除了是尋根者，也是行動者與失落者並存。身為政治受難家庭第二代的芬芳、余霽，成長過程閱讀《人間》、《南方》雜誌，參與環境自力救濟運動，也經歷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大學生訪調行動。參與社會運動過程卻引發父親進善對政治的恐懼，怒斥芬芳對社會運動的投入。父親的經歷對二代來說，彷彿迷霧。然而，進善也曾在戰後初期參與詩社，前往礦坑、工廠與民眾接觸，與年輕的余霽相互呼應。

余霽在學生時期是理想與反抗的象徵，成年之後投入政壇選舉，卻不再揭露政治與社會結構問題。推動小孩學習母語，也只是為了向選民交代。身為政治犯家屬與原住民雙重身分都像是政治選戰的加分題。顧玉玲也藉由書寫余霽看似政治正確的政治人物，卻承襲舊政治的權力手段。批判體制內改革的侷限與問題。顧玉玲藉由余霽、亞裔謝真家人對黑人的排斥，說著受壓迫方不必然等於政治正確與正義，

⁶² 顧玉玲，《餘地》，頁 297。

而深刻地反思權力本身。余霽某程度是理想的失落者，且是政治手段的繼承者。對顧玉玲而言，覺得對余霽的處理算是公道，當「他為了贏得選票，作了一些退讓。我並沒有那麼負面評價，因為這是他的現實。當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做了不同的選擇。」顧玉玲盡量可能讓角色面對甚麼樣的處境，做出什麼樣的回應、選擇。⁶³

顧玉玲書寫年輕世代中，塑造尋根者，也塑造了行動者與失落者。顧玉玲對於「民主完成式」的論述十分具有警覺與批判性，也就是歷史的發展非線性的過去威權、今日民主這樣的「民主完成式」，⁶⁴而是當下依然有許多待完成的議題，甚至有許多權力的再製。顧玉玲對於余霽的書寫，既回應臺灣政治運動從威權走向民主但其實非線性方向的走法，顧玉玲對於民主完成式的論述具有批判性。

六、結語

顧玉玲藉著遙遠之口說著對歷史必須溫柔：「重要的是現在如何說，因為怎麼說都不會是完整的，都可能被記憶改過了，所以要溫柔一點，允許否認，也允許不同意。」⁶⁵這一段話，對於多重殖民、白色恐怖、跨越族群、勞動底層等紛雜記憶，是一項很溫柔地提醒。

本文觀察了顧玉玲的書寫軌跡，從非虛構文學轉向虛構文學、從

⁶³ 顧玉玲受訪、李淑君訪談整理，〈顧玉玲《餘地》之訪談整理〉，未刊稿。

⁶⁴ 郝妮爾，〈角色在腦海裡敲打30年，窮盡一生的田野，捕捉不可言說之事：專訪顧玉玲《餘地》〉，網址：<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6274>，瀏覽日期：2023.09.15。

⁶⁵ 顧玉玲，《餘地》，頁215。

勞工文學轉向白色恐怖主題。在創作軌跡延續深刻地社會介入、回應當下，並在田野、在街頭、在抗爭、在訪談中完成寫作實踐。其次，本文提出《餘地》呈現本土與左翼之間並沒有斷裂臺灣本土左翼史觀，與白色恐怖本土與左翼二分的社會輿論產生對話。

《餘地》以畸零地的意象，回應生存於餘地處境中的間隙者。間隙除了混雜的身分，更是非此非彼的尷尬處境與縫隙之人。其中，進善身處夾縫，第一層夾縫是在改朝換代而成為歷史錯的那一方；第二層夾縫是成為同伴的背叛者，在入獄幾個月釋放，成為沒有判刑檔案而無法被肯認的那方；第三個夾縫為世代斷裂而成為夾縫之人。余啟正則一生處於政治創傷的高度警覺、以不敢鬆懈的姿態記憶痛苦來拒絕遺忘，其難以被旁人理解的狀態亦與世代、他人、社會斷裂。此外，謝蔚海從中國遷徙來臺、成為建設工人，工殤而獻祭於國家，成為國家遺忘、階級底層、離鄉背景等間隙狀態。上述角色相互映照，是身處於餘地的間隙之人。

《餘地》中的女性為解密者與解夢者。廖惜、秋美都是貼近土地、認同部落之人。其身為女性、客家人、原住民等身份，在族群上是少數；在性別上是弱勢，少數又弱勢的女性卻是立足於土地、認同於部落、有能力解開身世之謎與解開夢境者。顧玉玲書寫年輕世代中，塑造尋根者、行動者與失落者三者並存。新世代勢必尋根才能理解與行動，然而，顧玉玲對於民主發展與轉型正義具有高度警覺，拒絕將歷史簡化為過去威權、今日民主這樣的「民主完成式」。綜上所述，顧玉玲《餘地》開展出白色恐怖、本土左翼、加害受害、女性角色、跨世代的複雜性，且溫柔地對待歷史並展現高度批判、深刻反思的視野。